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丛书主编 黄旦

范式的变更： 新报刊史书写

书中的论文虽然角度不一，研究的对象各有特定的落脚点，但都显示出探索新的报刊（媒介）史书写方式的努力和勇气。各篇论文在切入角度、材料的使用、分析的展开及其结论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呈现出中国报刊史不同以往的面貌。

主 编 黄旦
副主编 孙 藜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丛书主编 黄 旦

范式的变更： 新报刊史书写

主 编 黄 旦

副主编 孙 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所收入的诸篇论文,基本都是出自年青学者之手。作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的团队成员,他们力图改变中国报刊史书写的既有路径,即重内容,轻媒介,将后者视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或容器,而是从媒介理论入手,把不同媒介概念化,并由此重新理解媒介及其历史实践,展现报刊与社会及人的新的面向。书中的论文虽然角度不一,研究的对象有异,各有特定的落脚点,但都显示出探索新的报刊(媒介)史书写方式的努力和勇气。各篇论文在切入角度、材料的使用、分析的展开及其结论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呈现出中国报刊史不同以往的面貌,同时也为改进并提高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 黄旦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13-18654-6

I. ①范… II. ①黄… III. ①报刊-新闻事业史-
中国-民国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329340 号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主 编:黄 旦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版人:谈 毅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8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8654-6/G

定 价:5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2.5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9815625

前 言

大约是在三年之前(或者更早?)吧,我们组成了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团队,参与的成员基本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毕业的并且是在上海工作的博士。这些同学原本对中国报刊史就有兴趣,其中不少人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研究,有不错的基础。其实在这之前,大家互相之间本来也就时常有所讨论,只是有些零散且大多因事而起。鉴于此,我们就把大家组织起来,以沙龙的形式定期举办活动,一方面有一个共同讨论切磋的场所和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凝聚力量,形成共同体,在创新中国报刊(媒介)史书写方面互相激励一起努力,并命之以“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团队,以示师出有名。

除了团队成员间私底下不同渠道的交流,整个团队一般是一个月活动一次,大家或是共同阅读推荐的书籍,然后结合报刊史研究,交流阅读的体会和启示;或是团队成员报告自己最新完成的文章,大家互相评点,为下一步修改献计献策;我们也会一起组成 Panel,参与某个学术会议,听取同道的意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挑选其中比较成熟的文章,推荐刊物公开发表。总之,读书、谈体会,写文章、讨论,互为启发,激发想象,扩展视野,共同提高,推出成果,这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几年来一直充满活力。虽然大家分处不同地点,公事私事纷繁,但凡到了约定的时间,无论刮风下雨,都会按时齐齐到来,除非是因特殊原因不得已而临时请假。

关于新报刊史书写,并无现成的路子可走。从最初的致力于提出报刊史自

身的问题，到逐步明确在重新理解报刊(媒介)及其与传播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将报刊(媒介)概念化，并以此为视野来考察报刊(媒介)的历史实践，是我们几年来不断思考逐渐清晰并慢慢有所形成的一个路径。关于这个总的想法，在本论文集的代序中有比较清楚的表达。当然，这只是代表着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思考的程度，随着我们团队不断摸索和深入，修订甚至改变原有的某些想法，也是在所难免。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是希望自己的设想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越来越明确，至少在一些关键紧要之处，其含义和层面能更加具体和清晰。

想法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现在收录在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就是这三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的一部分。文章的主题各自有别，风格更是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作者们都力图用一种新的眼光和思维，来打量并揭示中国报刊(媒介)的历史实践，开拓出新的问题。我最近在一篇小文中说道，我们不应该因循守旧，而要为中国报刊史和新闻传播思想史增发一些“新的性情”。就这一点而言，本论文集集中的这些文章多多少少都是做到了的，读者只要看一下文章题目，对此就应该有所察觉。创新要远比守成艰难，正因如此，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了反复修改，不知道来来回回改了多少次，打磨的时间都在一两年之上，作者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是不难想见的。

需要说明的是，论文集集中的这批论文，之前都是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过的。文章的顺序排列，主要以不同媒介出现的先后时间为准。在这次出版之前，其中部分文章又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增删。值此之际，我们要向《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社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了他们的支持，我们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大大受到激励和鼓舞。这次，又是蒙他们的慷慨允准，这些论文得以再次集结出版。对于这种学术上的无私而又真诚的扶助，我们始终铭感在心，并将一定以自己的更加努力作为回报。

俗话总是说，一个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固然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头，但绝不敢说已有“成功的一半”。所以，我们只有借此良机，不断拓展和深入，以期将来能拿出更好的成果与学界同仁分享。如果本论文集能起到媒介的作用，致使有更多的同道愿意与我们一起，投身到推进中国报刊(媒介)研究和书写的创新之中，我们当是欣喜不已。

黄旦

2017年11月

目 录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黄 旦 (1)
18 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	
——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	詹佳如 (20)
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	孙 黎 (41)
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郭恩强 (73)
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	
——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黄 旦 (91)
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	周叶飞 (120)
旗灯·钟楼·电话:火警媒介与城市空间	金庚星 (138)
空间与媒介交织中的游戏场娱乐:大世界与《大世界》报	
(1917—1927)	季凌霄 (159)
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	
(1949—1966)	董 倩 (174)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黄旦

摘要 本文梳理了现有中国报刊书写的两种路径,一种属于“现代化”逻辑,一种则是“革命史”逻辑,在这两种看似差异甚大的书写方式中,在史观及其对于报刊的看法上,却有着共享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以及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

关键词 新报刊史书写 范式变更 历史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成绩卓著。别的不说,单是重大项目的不断产生,皇皇巨著的接二连三面世,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①。的确,近些年有些乏力,类似于猛冲过后的气喘吁吁步履沉滞。虽然还不能采用报刊史研究者的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高潮之后的衰落,但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针对此种状况,近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针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意见,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国报刊史的文章。前者是通过与研究现状的批评,不断清理并明晰自己的想法;后者则是动手,尝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探索。批评也好研究也罢,均是从不同具体问题入手,有感而发,事先并无一个整体构想,大致是属于边读书、边思考、边研究的状况。有意思的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东西虽然杂乱却未必无序,相反,草灰蛇线,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显露出自身的某些轨迹和眉目。仔细一想,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人的思考总是受其知识积淀、学

^① 具体可参方汉奇:《花枝春满蝶舞蜂喧——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载方汉奇:《报史与报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38—61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序言》,载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术趣味及经验感受所刺激,在一个时期,总会有其特定的学术兴奋点。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今重新整理思绪,把已有的这些思考和研究稍作梳理,姑且名之为“范式变更”意义上的“新报刊史书写”,尽管其认识之粗浅仍是在所难免。

冠之以“新报刊史”,自然是相对于已有的中国报刊史书写而言。在习惯上,“新”总是与“旧”拘牵一起,“新”为先进,“旧”为过时,“新”和“旧”被看成是一个前后承继和更替的过程,属于时间的范畴。因此先做一点说明是有必要的:此处的“新报刊史”之“新”,强调的是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主要表示其视野不同于之前的报刊史,好比另取一条新径,另开一个新的窗口。借用以赛亚·柏林的话,“新历史仅仅是从今天人们所说的不同‘视角’所写的历史。新历史想去记录的那类事实是不同的,着重点也是不同的,在所问的问题以及随之所用的方法上,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因而,在什么东西构成证据,以及什么是‘事实’这些问题上,概念与词汇反映着观念的变化。”^①“新径”和“窗口”之辟,自有原来所不及之价值,但亦不必非以废除和取代它们为代价(当然不可能不遭受压力和冲击),我更愿意说是为丰富视角,各竞风骚,知长见短,激发想象,刺激变革,共同提高。由此说来,“范式的变更”,也就不等于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②套用一下时髦,新报刊史之“新”乃创新之“新”,非新桃换旧符之意。创新之“新”,意在导入研究的活力,摒弃“路径依赖”的习惯及其诱惑,不断探寻、体味学术求索之乐趣,展示报刊色彩斑斓之本真;新旧更替之“新”,则易陷入非此即彼,孰优孰劣,倘一不小心自我膨胀,就会流露出黑格尔所形容的“一种乞丐式的骄傲”^③。在学术研究当中,一个学者难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向往和渴望,以求取自我眼界和知识储备的最大可能之扩展,这是正常的,但要十分警惕未达绝顶人为峰,尚“站在城楼观山景”,就自以为“望断天涯路”,指点江山无知无畏。如此一来,即便真的有所推陈出新,亦可能是从一种单一跨入另一种单一,并且以藐视乃至扼杀其他可能为前提。进而言之,以“会当凌绝顶”的求索毅力,跳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展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形地貌,或许是一种隐喻:它表征着一个学者,乃至一代代学者孜孜以求前赴后继

① 以赛亚·柏林:《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载《自由论》,62—103页。

② 参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尤其是第一章和第十章,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37页。另: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学历史的人,最要紧的,就是要谦虚,越看前人的成绩,越觉得自己渺小。”《史学、史家与时代》,载《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8—94页;引见85页。

的精神追求和梦想,更是喻意着他们学术生命之历程,尽管其推石上山般的宿命和结局都是早已明了的。

主旨既是要谈范式变更,自然就避不开库恩。库恩以科学家群体如何看世界,即他们共享的本体论认识论为据,揭示出科学及其实践实质上是“一套特定的共有价值与一个专家共同体所共有的特定经验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保证了这一团体的大多数成员最终找出一组决定性的论证”,而且形成了一种共有的范例——范式。因而,范式是沉潜渗透在研究实践之中并对研究者起着支配作用的“意会知识”^①。库恩的立足点,是从科学实践入手而不是科学家群体的自我声称,这启示我将目光主要投射在报刊史的书写本身,至于书写者的表白和研究者的议论,均不能脱离书写空谈。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这里的关于报刊史书写的“范式”,倒是与海登·怀特“元史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或“深层意识”^②有更多的亲近。原因当然不在于库恩的范式针对的是“科学”,其言说方式是科学式的,犹如怀特说的,“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全的”,^③而是因为库恩意在揭示“范式”与科学历史变迁的关系,重点是范式的来源、形成、作用及其在历史中的革命性断裂,从而颠覆了科学是积累式发展的固有结论。至于范式本身的结构,它是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和书写中体现的等等,并非他特别着力之处;而后者,正是怀特打算要做的,也是我意图探讨的。因此,我所谓的范式,是怀特意义上的历史叙事的范式,不是库恩展示的认识论层面的知识结构同质化或一种共有的科学意识形态,尽管从泛义上说,二者不可能没有关联,但各自的重点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

怀特是用“元史学”来抽象概括历史叙事的基本形式结构及其类别。依他的意见,“叙事”是一种“元代码”,一种“人类普遍性”,“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中的一种”。“有关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就是借此得以实现。以“元史学”眼光看过去,历史不仅就是一种叙事形态,是“如何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类,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吸收的形式”,^④并且不同的历史话语,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79,171,161页。

②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序言,1—2页。

③ 前揭海登·怀特,中文本前言,3页。

④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1—2页。

都形成自己的一套言说形式,其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范式,规制着历史学术实践。“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的一种范式”,并且它被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①,否则所谓的历史叙事,压根就无从下手。恰如伯林说的,“模式,也只有模式,才能使所有事物产生、消失,并给予其目的,也就是说,是它们具有价值与意义”。“提供历史解释不仅仅是描述事件的系列,而是使其成为可理解的;使其成为可理解的,就是显示基本模式——不是若干个可能的模式之一,而是那唯一的计划。”“除非一个事件,一个人的性格,这一或那一制度、群体或历史名人的活动,被解释为它在这个模式中的必然后果(这个图式越大,即越全面,它就越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图式),否则,就没提供什么解释——因此也就没有历史叙述”。^② 依此看,利奥塔说,现代性所面临的的就是“叙事的危机”,^③未必是危言耸听。

现有中国报刊史存有叙述的“深层结构”——范式,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不少学者早就指出过。比如,“我们所编写的讲稿与教材,都不同程度地类似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④,一定程度上就已一语道破。当然,着眼于整个中国报刊书写的历史,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根据丁淦林先生的勾勒,中国新闻史书写或者说叙事,可分为两种“范式”。一是由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注重新闻传媒自身变迁,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方面;一是自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延续而来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⑤

上面的这些意见及其概括都切中肯綮,足以引发思考。然而,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赞同怀特说的,“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⑥那么,讨论中国报刊史

① 前掲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序言,1页。

② 以赛亚·伯林:《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载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104—185页;引见116页。

③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28页。

④ 宁树藩:《关于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科研工作加速学科建设问题》,载《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58—163页;引见158页。

⑤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总第91期),28—32页。

⑥ 前掲海登·怀特:3页。

书写的重点,就应该是原有范式究竟是如何“谈论事件”而不是对象——研究什么。以奥德里库尔说法,“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①而这,恰恰是之前关于范式讨论所忽略了的。换言之,在学术实践中,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并无必然关系,研究对象的变更,可能带来角度的变化,但未必就属于两种“范式”。在如何研究上陷入困境,试图通过研究什么的变化来打开通道,好比是撞了南墙又冲向北墙,韧劲固然可嘉,结果是不难想见。举一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有学者身体力行,试图以“竖三民”为点,“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的特点进行研究的道路”^②,此人就是当时正处于逆境中的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他认为过去的报刊史研究着重于宣传“内容”,而忽视了“如何宣传”,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思想、宣传方法和新闻业务若干观点和问题”^③,在他看来,这才是报刊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其实,宣传什么与宣传思想或者策略,不过是一体两面。因此,尽管王中先生细致入微地揭示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的各自不同特征,它们公开的声称与内里修辞所含意义形成的微妙张力,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几份报纸的具体感观和认识,迄今为止仍然是“竖三民”研究的典范之作,但他突破模式的设想却落了空,因为他仍然是在革命史轨道里,仍然是报刊如何为政治服务,其贡献不过是打开另一扇一直未受足够重视的侧门——革命派是如何使用报纸而有别于此前的宣传了什么。到最后,我们除了知道资产阶级的报刊不是一块铁板,而是拥有不同的策略、观念和方式从事各自的宣传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如果研究“如何宣传”,亦即报刊所具的“宣传思想、宣传方法和新闻业务”就是报刊史本身的特点,报刊史也就是“如何宣传”的历史。这种对报刊性质的认定及其历史事件的基本谈论方式,与其说是对原有路数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革命史”或者“政治史”范式的一种修补,添加某一部分内容的深描,这当然有重要价值,至少提醒我们要小心鉴别,不能随手套一顶革命派或保皇派帽子就万事大吉,但却无法成为突破原有模式的支点。因此,究竟是“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方面”,还是“以中国共产党

① 转引自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3页。

② 王中:《〈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载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89—200页;引见189页。

③ 王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载赵凯主编:《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9—187页;引见130页。

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各自在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重点上的差异，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范式的引线，但范式必然不以书写对象为根本依托。所以，我们需要转变一下角度，直接从“谈论事件的方式”插进去。

先看戈公振。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①，关于报纸的这个界定，蕴含着在戈氏看来报纸所不可缺少的两个原质，第一个是内容方面的，那就是新闻（时宜性与一般性的结合），“新闻为报纸内容之原质”。^②由此看，说戈公振是以新闻为本位，也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还有另一个与此并列的原质，即其“外观的原质”——“公告性”。“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藉此决定了报纸不同于私函，后者不是如报纸一般，“写与多数不定之人”。因而就可下这样的判断，“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③戈公振引经据典提炼出外观和内容的两个“原质”（“公告性”和“新闻”），既是为解决报纸是什么的问题，更是以此为自己预先筑起整个叙事的第一级阶石。“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④戈公振的两个“原质”，就好比两条网维，织就了其“想象的网面”。据此，他方能顺利地“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

然而，两个“原质”在报纸的构成上是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却有不同。“公告性”作为“消息传达之方法”，标志着报纸的“外观原质”，实际上奠定了报纸之所以是报纸的那个基质，没有“公告性”，新闻或许照样存在但不可能是报纸。因为“公告性”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公开，而是标明报纸与民众的血肉关联，表示报纸的实质，是“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之内”，借此“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⑤既然如此，“公告性”必定是恒定不变而且也是不能变的，尽管其程度可能有差别。与此不同，“新闻”则是不定的，是顺应社会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⑥，此种变化始终是在“公告性形式的限制之下”，被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6页。

② 前揭戈公振，16页。

③ 前揭戈公振，13页。

④ 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载《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7—144页；引见135页。

⑤ 前揭戈公振，19页。

⑥ 戈公振自己的说法是：故观察报纸之原质，其外观之公告性毫不变更，只其内容之新闻有变更。……所谓内容的新闻之变化，不外求适合于社会而已。（前揭戈公振，18页）

要求“适合于公告性的形式”^①。这样两个原质的变与不变,就构成了戈公振书写报刊史的第二级阶石:以公告性为尺度,以报纸内容变化为重点,确立叙述的逻辑,铺陈开报刊的历史。戈公振是以报纸的外观“原质”——“公告性”之形态(谁的公告,何种公告),来打量“新闻”——报纸内容原质的历史变化(公告了什么,如何公告,为什么是如此公告),并由此与社会需求变动发生连接。这,即是“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试图所要表达的大致意思。^② 瞄一眼《中国报学史》的谋篇布局(官报、外报、民报),对于此种书写——“谈论的方式”,就有清晰印象。戈公振显然也因此碰到了困难,比如第五章的“民国成立之后”,就与全书逻辑不谐,看上去是不得已而临时处之。至于具体的展开,因无法完全纳入这样的架构而不得不模糊处之,则是随处多有,甚至连自相矛盾也在所不顾。好在以资料为长^③(相比较而言,戈公振的叙事能力似不如白瑞华),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被有所遮掩,至少显得不是那么扎眼。

戈公振的“公告性”及其民众是借此“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倒很像一个人说的话,而且早于戈公振 29 年,此人就是塔尔德。他说:“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私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力量”。“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公众”,这个公众是“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④ 戈公振这番话,也很像另外一个人的口吻,不过要晚于他 24 年,“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⑤ 说此言者,乃为大名鼎鼎之哈贝马斯也。东海西海,为何就如此这般心同此理呢?原因不复杂,戈公振和塔尔德、哈贝马斯一样,都是在启蒙运动所肇始的“现代性”脉络中,亦即“公共性”范畴理解和讨论报纸,重点是报纸和民意表达,某种程度上是对康德所谓“理性的公共使用”的解说和阐释^⑥。

① 前揭戈公振,18 页。

② 前揭戈公振,1 页。

③ 就后来发现看,史料中也存有不少错谬,参宁树藩:《〈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载《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年,513—541 页。

④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245,214 页。

⑤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16 页。

⑥ 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化: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61—67 页。

在这个意义上看，戈公振的报刊史书写，大致属于李怀印所总结的中国近代历史书写的“现代化”范式的一部分，“写史意味着建构一种宏大叙事，以支撑当时与民族建构和/或国家建设有关的各种方案”。^① 因此，官报、外报和民报的历史，就是一个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的过程，最终不免产生“文学之兴衰，系乎国运之隆替”的感慨。也正是由此，使得戈公振对民国以来之报纸，“其精神远逊于清末”而深为不安和困惑。聊为可慰的是，人民在报纸长期熏陶下，终在“渐知个人之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② 以此反观戈公振的“官报”“外报”“民报”之划类，以及在时间上止于民国建立，恐怕会令人产生更多的想象和读解。自然，在1949年前，循此范式的除了丁淦林先生提到的胡道静外，白瑞华、汪英宾等也可以归入其中，走得最远的要算是林语堂，为此甚至信口开河随意解释，连基本历史语境都可弃置一边。^③

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报刊史书写，在广义上，属于中国近代史叙事中的“革命”范式，“强调革命主题，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革命的胜利”。^④ 就其特殊根源，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说，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由此演化而来的党报基本思想。不过与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如果说延安时期的范文澜就在为革命叙事做努力，而且初见成果的话^⑤，那么，其时共产党人所关注的完全是报纸的现实运用，是如何发挥其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不是其来龙去脉和历史过程。可以这样说，在学科化之前，除了零星的文章，并没有构成报刊史研究的“革命叙事”范式，也没有享有盛名的报刊史家，这一点，与史学的状况大不一样。^⑥ 中国报刊史的“革

①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36页。

② 前揭戈公振，62，177，196，198页。

③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 前揭李怀印，16页。

⑤ 参前揭李怀印，第三章。

⑥ 按李怀印的说法，在1949年之前，中国就有不少资深的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他们或是受过严格的以考据为重的传统训诂学之熏陶，要么接受过西方史学传统的训练。见前揭李怀印，22—23页。据我目前的有限阅读，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文献中，几乎没有是讨论报刊历史的。

命”叙事之正式起步,则是在1949年之后,与“50年代初,学习苏联经验,强调教材要完整,要有讲义和大纲”的高校教育变革有关,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56年初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及其座谈会,由此形成了“第一个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团队、第一个讨论中国新闻史教学问题的座谈会”,并有了“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①。所以,报刊史的“革命”叙事是与新闻学科化建设相伴而行互为规定:“革命”叙事圈定了报刊史书写的基调、逻辑及其范围,报刊史的学科化,一举奠定了“革命”叙事的正统地位,“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②

卢卡奇说,“当革命成为衡量史学有效性的标准时,历史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同义反复——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③ 开宗明义,报刊史的“革命”叙事,自然从“革命”而不是从“报纸自身”开始。在他们看来,报纸是什么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阶级斗争工具”论早就一言以蔽之。就其发生论,“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必定生存在不同政治制度中,成为不同政治权力的工具,比如就可区分为人民大众的报纸和专制主义的报纸^④。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很简单,生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⑤ 阶级利益决定上层建筑——报刊性质,性质决定了报刊的脑袋和实践,甚至对于新闻的兴趣都是有“阶级性”的^⑥。共产党的报纸是如此,以此类推,其他报纸也在所难免,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倒向另一面。如果说戈公振是由内向外,提取报纸的两个“原质”折射出报纸与社会的关系,那么,“革命”叙事则是

① 前揭丁淦林,28页。

② 前揭丁淦林,28—29页。

③ 转引自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05页。

④ 陆定一:《人民的报纸》,载《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340—342页。

⑤ 廖盖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新闻战线》,1960年第8期,3—8页;引见3页。

⑥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321—330页;引见323页。



自外入内,将阶级——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区别,直接植进报纸,从报纸的政治隶属及其立场,判定其在历史上地位:红与白,我与敌,不容半丝混淆,也不容一点骑墙,由此确立起报刊史革命叙事的基本前提。

前提既定,报刊历史展开的依据和评判标准也就随之明确,亲身参与1956年中宣部举办的报刊史教学大纲讨论会的廖盖隆,四年后,亦即在1960年,对于如何评定报刊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报刊在其中的作用,有过这样一番的具体解释:

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的新闻事业对于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很重大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都是,首先是造成舆论(争取群众),然后是夺取政权,接着是改造生产关系和迅速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进步的新闻事业,是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开路先锋。

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①

廖盖隆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九十周年而作,但借此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斗争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及其实践原则,做了全面的说明。就廖盖隆的党内身份、地位和影响,他的文章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可以被认为代表着当时对于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总体认识,从中可以窥见那个教学大纲草稿的思想来源以及所要展开的思路。于是形成萨明所归纳的“两极性模式”,“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②后来革命叙事范式下的中国报刊史,就是由此排列出报刊的等级秩序:革命/反革命、进步/落后,并以此明确了其书写逻辑,这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

既然如此,以“革命”为叙事动力的报刊史,“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③也就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这首先体现

① 前揭廖盖隆,3页。

② 转引自前揭阿里夫·德里克,201页。

③ 宁树藩:《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分别载《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47—157页;496—504页。

在框架上。20世纪50年代依据阶级斗争表现形式所建立的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①,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报刊历史分期的依据。这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中国报刊史的“教学大纲草稿”中得以充分体现,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学教师们的认同,“对于大纲草稿所认定的基调和思路,毫无疑问地欣然接受”,甚至据说流露出“喜出望外”之情,因为此前熟知的都是国统区的那些报纸,所以都希望借此能补上之前不了解革命报刊历史之憾^②。自此之后,中国报刊史的书写就没有越出过这一框框。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其他中国报刊史书籍也大多如此。其次,时间——分期的确立,又决定了报刊实践的特征以及在摹写中要突出的。由此想起汉诺·哈特针对传播学研究历史所指出过的,“它们的作用是强化特定的立场,而不是回答传播学在社会理论语境下所面对的问题。”^③只需把其中的“传播学”换成报刊书写,完全可以说明分期和革命叙事的关系,从而“突出理论观点”“立论在先、叙述史实在后”在所难免,内容上“不够完整、不够全面”,缺少“全国观念”和“全局观念”^④,“只着意从言论和文章中分析报纸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而对于新闻却很少顾及”,^⑤更严重的是给人造就“革命兴则报业盛,革命败则报业衰”^⑥的总体印象。

由此,总体而言,我赞同丁淦林先生说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主要就是这两种范式。那么,如何评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呢?这部集聚了几乎全国所有报刊史研究者力量和心血的著作,其涉及之广,规模体量之大,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被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显然不能避之不谈。

在该书的序言中,我们读到了对于新闻史有这样的理解:“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然而,该书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所理解的新闻事业,就像戈公振所理解的“报纸”,或者

① 前揭李怀印,第四章。

② 前揭丁淦林,29页。

③ 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4;4页。

④ 前揭丁淦林,30页。

⑤ 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载《宁树藩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92-107页;引见105页。

⑥ 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总第91期),33-38页;引见34页。